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施特劳斯集

刘小枫 ● 主编



[美]施特劳斯 ● 著

# 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托芬

Socrates and Aristophanes

李小均 ● 译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HERMES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施特劳斯集

刘小枫 ● 主编



# 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托芬

Socrates and Aristophanes

[美]施特劳斯 | 著  
李小均 | 译

华夏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托芬/(美)施特劳斯著;李小均译.-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1. 5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ISBN 978-7-5080-6475-8

I. ①苏… II. ①施… ②李… III. ①苏格拉底(前 469~前  
399) — 哲学思想 — 研究 ②阿里斯托芬(约前 450~前 385) —  
谐剧 — 文学研究 IV. ①B502. 231②I545. 0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67611 号

Socrates And Airstophanes

By Leo Strauss

Licens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U. S. A.

©1966 by Leo Strau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由华夏出版社出版。

未经出版者预先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7-3454

## 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托芬

[美] 施特劳斯 著

李小均 译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建筑工业印刷厂南厂

装 订: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开

字 数: 297 千字

印 张: 11

定 价: 36.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 HERMES

在古希腊神话中，赫耳墨斯是宙斯和迈亚的儿子，奥林波斯神们的信使，道路与边界之神，睡眠与梦想之神，死者的向导，演说者、商人、小偷、旅者和牧人的保护神……

古典教育基金·正则资助项目

## “施特劳斯集” 出版说明

1899年9月20日，施特劳斯出生在德国 Hessen 地区 Kirchhain 镇上的一个犹太家庭。人文中学毕业后，施特劳斯先后在马堡大学等四所大学注册学习哲学、数学、自然科学，1921年在汉堡大学以雅可比的认识论为题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24年，一直关切犹太政治复国运动的青年施特劳斯发表论文“柯亨对斯宾诺莎的圣经学的分析”，开始了自己独辟蹊径的政治哲学探索。三十年代初，施特劳斯离开德国，先去巴黎、后赴英伦研究霍布斯，1938年移居美国，任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讲师，十一年后受聘于芝加哥大学政治系，直到退休——任教期间，施特劳斯先后获得芝加哥大学“杰出贡献教授”、德国汉堡大学荣誉教授、联邦德国政府“大十字勋章”等荣誉。

施特劳斯在美国学界重镇芝加哥大学执教近二十年，教书育人默默无闻，尽管时有著述问世，挑战思想史和古典学主流学界的治学路向，身前却从未成为学界声名显赫的名人。去世之后，施特劳斯才逐渐成为影响北美学界最重要的流亡哲人：他所倡导的回归古典政治哲学的学问方向，深刻影响了西方文教和学界的未来走向。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施特劳斯身后才逐渐扩大的学术影响竟然一再引发学界激烈的政治争议——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觉得，施特劳斯对自由民主理想心怀敌意，是政治不正确的保守主义师主；后现代主义者宣称，施特劳斯唯古典是从，没有提供应对现代技术文明危机的具体理论方略。为施特劳斯辩护的学人则认为，施特劳斯从

## 2 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托芬

来不与某种现实的政治理想或方案为敌，也从不提供解答现实政治难题的哲学论说；那些以自己的思想定位和政治立场来衡量和评价施特劳斯的哲学名流，不外乎是以自己的灵魂高度俯视施特劳斯立足于古典智慧的灵魂深处。施特劳斯关心的问题更具常识品质，而且很陈旧：西方文明危机的根本原因何在？施特劳斯不仅对百年来西方学界的这个老问题作出了超逾所有前人的深刻回答，而且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应对方略：重新学习古典政治哲学作品。施特劳斯的学问以复兴苏格拉底问题为基本取向，这迫使所有智识人面对自身的生存德性问题：在具体的政治共同体中，难免成为“主义”信徒的智识人如何为人。

如果中国文明因西方文明危机的影响也已经深陷危机处境，那么施特劳斯的学问方向给中国学人的启发首先在于：自由主义也好，保守主义、新左派主义或后现代主义也好，是否真的能让我们应对中国文明所面临的深刻历史危机——“施特劳斯集”致力于涵括施特劳斯的所有已刊著述（包括后人整理出版的施特劳斯生前未刊文稿和讲稿；已由国内其他出版社出版的《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及其起源》、《思索马基雅维利》、《城邦与人》、《古今自由主义》）除外），并选译有学术水准的相关研究文献。我们相信，按施特劳斯的学问方向培育自己，我们肯定不会轻易成为任何“主义”的教诲师，倒是难免走上艰难地思考中国文明传统的思想历程。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典籍编译部甲组

2008年

## 中译本说明

早在“九一八”事变的前一年，罗念生先生就将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约公元前446 - 386）的《云》剧译成了中文，而且是研究性译法，文献和注释俱全。第二共和之初，适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纪念阿里斯托芬诞辰两千四百周年，罗念生、周作人、杨宪益三位先生合作，翻译出版了《阿里斯托芬喜剧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共收剧作五种：罗念生译《阿卡奈人》、《骑士》、《云》；杨宪益译《鸟》；周启明译《财神》。几年后，苏联古典学家雅尔荷的《阿里斯托芬评传》也译成了中文（作家出版社1958）。

尽管如此，汉语学界对阿里斯托芬剧作置若罔闻长达数十年——改革开放后的汉语学界，仍然没有看上阿里斯托芬，似乎两千多年前在雅典剧场上演的阿里斯托芬的搞笑剧与我们的现代生活没什么相干。不仅我们中国学界看不出古老的阿里斯托芬剧作有何现实性，西方学界同样如此——与古希腊肃剧研究相比，西方古典学界的阿里斯托芬研究要薄弱得多；至于哲学思想界，论及古希腊肃剧的时有所见，却鲜有搞哲学的论及阿里斯托芬。

作为芝加哥大学政治系教授，政治哲学史家施特劳斯竟然写下了对阿里斯托芬的全部传世剧作的绎读，会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甚至让人觉得不务正业：阿里斯托芬与政治学或政治哲学有何相干？如果我们认识到如下思想史内情，就不得不敬佩施特劳斯的非凡眼力：十九世纪末的尼采以激烈抨击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起家，挑明了作为现代性问题的苏格拉底问题。尼采的苏格拉底批判相当程



## 2 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托芬

度上来自阿里斯托芬对苏格拉底的批判，沿着尼采的思路，海德格尔不仅进一步贯彻对柏拉图的批判，甚至勾销了苏格拉底问题，对苏格拉底视而不见、不闻不问——与海德格尔不同，施特劳斯针对尼采的苏格拉底批判，亲自重审阿里斯托芬的苏格拉底批判，最终矫正了尼采的眼力，进而彻底扭转苏格拉底问题的性质：苏格拉底绝非“现代性漩涡”的肇事者，遗忘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才是“现代性漩涡”的真正源头。

1961年，施特劳斯在给伽达默尔的信中曾这样谈到自己研读阿里斯托芬的感受：

不管怎样，在研究《云》（以及阿里斯托芬的其他喜剧）时，我学到了某些在任何现代人那里都学不到的东西：对阿里斯托芬喜剧最深刻的现代解释（黑格尔的）远不及柏拉图在《会饮》中对阿里斯托芬所作的阿里斯托芬式的呈现（海德格尔对喜剧保持沉默。至于尼采，请参《快乐的科学》，格言1）。一句话，我相信，即便现代艺术哲学摆脱了美学的偏见，其基础也过于狭小了。（施特劳斯，《回归古典政治哲学》，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

通过研读古典作品，施特劳斯“学到了某些在任何现代人那里都学不到的东西”——这一经验对我们后学的问学之路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因为，我们不断听到这样的告诫：放弃研读现代的东西是一种严重的偏颇，一百年前的人写的东西都没有时代意义，遑论两千年前的。施特劳斯指出的古典学问旨趣的关键在于：对恒古不移的人世问题的理解，古人比今人深刻——这并非施特劳斯的独见，而是思想史上虽为数不多却也并非寥寥无几的伟大思想家的共识。对于不断在我们耳边响起的告诫，有心向学古典学问的青年大可不必在意，自己心里有数就行。

《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托芬》不仅平实而且平淡，看似不过在逐部

绎读十一部剧作而已，卑之无甚高论，既没有斧凿而成的解释理论，也没有原创性的自说自话，实则义生文外，秘响旁通。翻开目录，稍微留意一下全书篇章布局，也能感觉到有颇值细心品味的东西在焉。全书分四章，但奇怪的是，第一章和第四章分别为非常简短的引言和结语，有如古希腊剧作常见的前台戏和退场戏，中间夹着诸戏段——如此驭篇会不会是互体变爻化成四象，微显形而上学之书常见的四章结构呢？第二章专解《云》剧，第三章按演出时间顺序逐个解读阿里斯托芬的十部剧作——把《云》剧从演出时间顺序中抽取出来，专辟一章绎读，显然因为此剧主角乃苏格拉底。从而，苏格拉底问题是解读阿里斯托芬其余剧作的前提和基础，即便对那些作于《云》剧之前的剧作也应如是观。

罗念生先生生前未能译完阿里斯托芬的全部剧作，晚近有张竹明先生全译本（江苏：译林出版社 2008），为我们阅读本书提供了方便（剧作人物译名大多以此为准），尽管这个全译本因未经笺释考究仍然不足以支撑研究性阅读——反过来讲，施特劳斯的这部著作则为我们阅读阿里斯托芬的剧作提供了门径：没有施特劳斯的慧眼，我们的确很难看出有时近乎粗俗的戏谐谑中的严肃和高贵。

施特劳斯的老同学和终身挚友克莱因为本书写过一篇短小书评，以其惯有的言简意赅文风为我们阅读本书提供了极为难得的指引，这里一并译出收作附录。

刘小枫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古典文明研究中心

2010年2月

# 目 录

中译本说明 .....	1
第一章 引言 .....	1
第二章 《云》 .....	8
第三章 其他谐剧 .....	55
1 《阿卡奈人》 .....	55
2 《骑士》 .....	80
3 《马蜂》 .....	115
4 《和平》 .....	140
5 《鸟》 .....	167
6 《吕西斯特拉特》 .....	206
7 《地母节妇女》 .....	225
8 《蛙》 .....	248
9 《公民大会妇女》 .....	277
10 《财神》 .....	298
第四章 结语 .....	326
附 录	
克莱因 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托芬 .....	331
索 引 .....	334

## 第一章 引言

[3] 政治哲学包含在我们的伟大传统之中，由此，政治哲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似乎得到了担保。根据我们的伟大传统，政治哲学由苏格拉底创建。

既然苏格拉底述而不作，我们要了解创建政治哲学的背景或缘由，就全要仰赖他人的记载。麻烦的是，相关的记载相互间颇有抵牾。我们主要依靠的是柏拉图的诸多对话、亚里士多德的某些评论、色诺芬（Xenophon）的苏格拉底作品，以及阿里斯托芬的《云》（*Clouds*）。亚里士多德是从书面文字和口耳相传中了解苏格拉底的；阿里斯托芬、色诺芬和柏拉图都与苏格拉底本人熟识。色诺芬和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朋友，崇拜苏格拉底，但阿里斯托芬不是苏格拉底的朋友，也不崇拜苏格拉底；他似乎把苏格拉底塑造成了苏格拉底本人所说的智术师（*sophist*）。当今学者在使用柏拉图的对话之前，通常要做两方面的判定：在代代相传以为是真的这些对话录中，必须判断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另外，必须对下面这个论点进行判断（支持该观点的部分前提是所谓真实对话的写作时序）：只有早期对话才是苏格拉底的对话，或者说，早期对话无论如何比晚期对话更具苏格拉底色彩。无论我们怎么看待这两方面的判定，一般公认，柏拉图的对话不是报道，而是艺术作品（*works of art*）；既然是艺术作品，我们就没有铁证来区分哪些是苏格拉底自己的思想哪些只是柏拉图归于他的思想。在一封流传下来的柏拉图书信中，有这样一句话，

## 2 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托芬

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没有柏拉图的任何著述；人们现在归于他名下的，全都属于变得美好（高贵）、年轻（崭新）的苏格拉底。

柏拉图的 [4] 对话录将苏格拉底“理想化”了。柏拉图从来没有保证，他笔下的苏格拉底谈话是真实的。柏拉图不是一位史家。苏格拉底同代人中唯一的史家是色诺芬，我们要了解苏格拉底，就必须依赖色诺芬的作品，色诺芬续写了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史记，通过引入“我曾经听他说”这样的表述，他至少保证其笔下的苏格拉底谈话的部分真实。那么，表面上看来，下面这个看法更有利：我们要了解苏格拉底，第一手资料就是色诺芬的苏格拉底作品。然而，仔细研究过色诺芬之后，我们或许会被迫修正这一看法，尽管如此，色诺芬作品的价值依然不减。倘若色诺芬的见证的价值长久以来没有遭到迅速而武断的抛弃，如今许多对苏格拉底的错误看法将得到避免。

如果说苏格拉底是政治哲学的奠基者，那就意味着哲学先于政治哲学。由此引发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前苏格拉底哲学能够或者说被迫省却政治哲学。这个问题正是“苏格拉底问题”（problem of Socrates）的题中之意，因为苏格拉底本人是从哲人转变为政治哲人的。这样看来，有必要考虑“青年苏格拉底”的问题，这也恰是柏拉图提醒我们注意的论题。在临终之日，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谈到，他年轻时对“人们称为探究自然的那种智慧”充满激情（《斐多》[*Phaedo*] 96<sup>a</sup>6-8）。在《帕默尼德》（*Parmenides*）中，柏拉图走得更远，甚至 [直接] 呈现了青年苏格拉底（127<sup>a</sup>4-5, 130<sup>b</sup>1-4）；这个青年苏格拉底似乎确实比《斐多》中谈到的那个青年苏格拉底要大一些，因为后者还只是“前苏格拉底”，而前者已经完成了向“理式”（ideas）的决定性转向。第俄提玛（Diotima）向苏格拉底揭示爱若斯（Eros）的秘密时，苏格拉底似乎也是年轻人；正如帕默尼德一样，第俄提玛肯定也盘问过苏格拉底。无论是否这样，

我们从色诺芬笔下得知，苏格拉底在提出什么是完美的贤人（perfect gentleman）这个问题之前，已经是大名鼎鼎或臭名远扬的自然哲人；什么是完美的贤人这个问题包含了他与自然哲学决裂之后全身心投入追问的所有这类探究。<sup>①</sup> 尽管如此，关于“前苏格拉底”的苏格拉底，我们在阿里斯托芬的《云》中发现唯一可得的展示。

《云》是对苏格拉底的攻击，或者说，阿里斯托芬是苏格拉底的敌人，但这些并不能成其为根据，质疑可以利用《云》来理解“青年苏格拉底”，因为攻击可能不无道理，敌人可以是公平的。或许有人说，[5] 柏拉图和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与谐剧诗人阿里斯托芬对自己笔下的苏格拉底的判断完全一致。在《云》首演约七年之后，柏拉图在《会饮》（*Banquet*）中将阿里斯托芬和苏格拉底带到我们眼前会面。<sup>②</sup> 这是在会饮接近尾声的时候，只有三人还醒着并且头脑清醒，其中两人就是阿里斯托芬和苏格拉底。那时，这三人经过友好的谈话，最后在对阿里斯托芬至关重要的一个主题——肃剧和谐剧的主题——上达成一致意见；阿里斯托芬同意了苏格拉底提出的观点。在柏拉图唯一涉笔阿里斯托芬的地方，诗人阿里斯托芬显得与苏格拉底非常亲近。从这个事实中，我们可以理解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对谐剧中灵魂状态的分析。在苏格拉底的分析中，我们洞悉到这一线索。谐剧中的灵魂状态是快乐与痛苦的混杂，我们看见友人无伤大雅的自视过高，可以欣然付之一笑，但也可因嫉妒他的智慧而痛苦；那种灵魂状态从未免除不公正（《斐勒布》[*Philebus*] 48<sup>a</sup>8 - 50<sup>a</sup>10）。友人的智慧或许并不是他自视的那么高，因此他可能有点好笑；但他的智慧也许足以高到成为嫉妒的理由。这种看法用

① 《齐家》（*Oeconomicus*）6.12 - 13, 11.3；《回忆苏格拉底》（*Memorabilia*）卷一.11 - 16。对观 Burnet, 《苏格拉底的申辩笺注》（*Apol. Socr.*）21<sup>a</sup>5。对观《拉克斯》（*Laches*）186<sup>b</sup>8 - <sup>c</sup>2。

② [译按] 据载，《云》首演于公元前423年；柏拉图的《会饮》场景发生于前416年。参施特劳斯《〈会饮〉讲疏》（*On Plato's Symposium*, Chicago,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页14 - 15。

#### 4 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托芬

来分析谐剧本身可能不够恰切，但是用来解释最杰出的（*par excellence*）谐剧《云》还是有道理：阿里斯托芬远非苏格拉底的敌人，而是苏格拉底的朋友，只不过他有点嫉妒苏格拉底的智慧——哪怕是青年苏格拉底的智慧。或者，有人可能也会这样说，谐剧诗人阿里斯托芬嫉妒的首要对象不是苏格拉底的智慧，而是苏格拉底可以自主地鄙视戏剧诗人必然依靠的大众掌声，换言之，阿里斯托芬嫉妒的是苏格拉底的完美自由。

即使我们不得不承认谐剧式处理必然是同情式处理，我们还是不能被迫断言，谐剧式处理就没有歪曲。在大众的眼中，哲人必然可笑，<sup>①</sup> 因而是谐剧的一个自然的主题。如果出于某种原因，阿里斯托芬碰巧选择了苏格拉底，他可以随意地将苏格拉底置于哲人可能落入的极端可笑境地，从中表现出来的特性，未必就是个别哲人苏格拉底的特性。但是，甚至在人们考虑这种可能性之前，就应该知道阿里斯托芬除了让观众开怀大笑之外是否还有别的关注。阿里斯托芬强调，他不只是取悦观众。他既关心说出可笑的东西，也关心说出严肃的东西。作为诗人，他关心的是使城邦里的人们变得美好高贵；作为谐剧诗人，他关心的是隐恶 [扬善]，即通过嘲笑邪恶，[6] 剥夺邪恶的吸引力。阿里斯托芬凭正义行事，教导对城邦有益的事情，或者说，他当着雅典人的面冒险说出何为正义；但是，身为谐剧诗人，除非用谐剧的手法来处理正义事物，否则他做不到这一点。善与正义（*goodness and justice*）在阿里斯托芬身边打架。他实际上既关心欢笑者的赞许，也关心智者（*the wise*）的赞许。<sup>②</sup> 但这难道不是意味着，因他带来的欢笑而热爱或崇拜他的那类人，截

---

① 《王制》（*Republic*）516<sup>a</sup>8 - 517<sup>a</sup>2, 517<sup>d</sup>4 - 6; 《泰阿泰德》（*Theaetetus*）174<sup>a</sup>4 - <sup>d</sup>1。

② 《阿卡奈人》（*Acharnians*）645, 655, 661 - 662; 《骑士》（*Knights*）510; 《蛙》（*Frogs*）389 - 390, 686 - 687, 1008 - 1012, 1049 - 1057; 《公民大会妇女》（*Assembly of Women*）1155 - 1157。

然不同于他那些智慧的热爱者或崇拜者？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有理由假定，阿里斯托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同样服务于（或许也是最重要的）教导正义这个目的——或许他通过将苏格拉底表现得荒唐可笑来反驳苏格拉底对正义的攻击，从而维护正义。这一点与阿里斯托芬并非苏格拉底的敌人可以并行不悖；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为了替正义的理由辩护而驳斥忒拉叙马霍斯（Thrasymachos），苏格拉底不曾是忒拉叙马霍斯的敌人，相反，在辩驳的过程中他们还成为朋友（《王制》[*Republic*] 498<sup>a</sup> - 499<sup>b</sup>）。

我们以上勾勒出的苏格拉底问题（其中包含了青年苏格拉底问题），只能作为尼采（Nietzsche）所提出的“苏格拉底问题”的预备：苏格拉底主张什么的问题，不可避免地变成苏格拉底主张之物的价值问题。换言之，回归我们伟大传统的源头变得势在必行，因为那一传统遭到了彻底质疑，可以说，这种质疑在尼采对苏格拉底或柏拉图的攻击中达到极致。尼采在其处女作《悲剧从音乐精神中诞生》（*The Birth of Tragedy*）中开始这一攻击。晚年尼采某种程度上否认了那部作品的价值。尽管如此，他关于“苏格拉底问题”的最初陈述依然是他就此问题的最广泛陈述；如果对照他后来的修正而读，人们可以把握住他年轻时的陈述的特征，这些特征尽管有些动摇，但他保持了终身。<sup>①</sup>

尼采在其关注的“审美的科学”（the science of aesthetics）语境中，将苏格拉底定位为“所谓的世界历史中唯一的转折点和漩涡中心”。他理解的这种科学既是形而上学也是生理-心理学；它是“自然科学”；按照《善恶的彼岸》（*Beyond Good and Evil*）中的观点，这种科学属于一种历史的生理心理学（historical physiopsychology）语境。尼采的关注不只是理论性的；他还关心德意志的未来或欧洲的

---

<sup>①</sup> 尤见《瞧这个人》（*Ecce Homo*）中论述《悲剧从音乐精神中诞生》（*The Birth of Tragedy*）部分及《偶像的黄昏》（*Dawn of Idols*）中“苏格拉底问题”一节，但最重要的是《善恶的彼岸》（*Beyond Good and Evil*）。



未来——他关心的是必须超越人此前所曾达到的最高成就的一种人类的未来。此前，人类的最高成就是希腊肃剧（Greek tragedy）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埃斯库洛斯（Aeschylus）肃剧所展现的生活方式。苏格拉底拒绝或摧毁了“肃剧式”（tragic）地理解这个世界，[7]因此，苏格拉底是“最值得考问的古代现象”，他是超逾人的尺度的人：是半个神（a demigod）。苏格拉底是第一个理论化的人，是科学精神的化身，是彻底非艺术或者说非诗艺（unartistic or a-music<sup>①</sup>）的人：“在苏格拉底身上，第一次产生了这样的信念，即自然是可理解的，知识的力量具有普遍疗效。”他是理性主义者的原型，因此，他也是乐观主义者的原型，因为乐观主义不仅相信这个世界是最可能好的世界，或者说而且相信这个世界可能变成所有可想象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相信知识可以将这个最可能好的世界中的种种恶变得无害：思考不仅完全能够理解存在，而且甚至能够校正存在；科学能够指引生活；舞台机关送出来的一个解围之神（a deus ex machina）可以替代神话中活生生的诸神，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弄清自然之力，利用它们服务于“更高的自我主义”（higher egoism）。理性主义就是乐观主义，因为它相信理性的力量是无穷的，本质上是有益的，或者说，它相信科学能解开一切谜团，松开所有锁链。理性主义就是乐观主义，因为对原因（causes）的相信取决于对目的（ends）的相信，<sup>②</sup>或者说，因为理性主义的前提是相信善的首要的或终极的至尊地位。苏格拉底引起或代表的这种转变，其全面和最终的后果仅仅在当代西方显现：相信普遍启蒙，从而相信一个普遍

---

① [译按] 这里的 a-music 从字面译作“非音乐的”，其含义其实已蕴涵在与其并置的同义词 unartistic [非艺术的、与艺术无关的] 中。在后文中，施特劳斯更经常使用的是 a-music 的另一种形式 a-Music（原文页 49，173，313 等）；大写的使用很可能指涉 music 的词源 Muses [缪斯们]——赋予人的种种艺术（诗作、音乐等）以灵感的女神们，故酌译为“非诗艺的”。

② Karl Löwith, 《尼采的同一物永恒复返的哲学》（*Nietzsches Philosophie der ewigen Wiederkehr des Gleichen*, Stuttgart, 1956），页 122。